

编者按:

作为重要的记忆机构,大众传媒不仅生产和流通有关过去的文本和图像,在不同的历史场景下展演纪念仪式、构造记忆空间,也通过“重访”过去来“介入”现实,由此而塑造着国族和社群认同。本专题中贺建平等人的论文发现,地方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纪念报道将战争创伤与“国耻”叙事相勾连。郭恩强则通过对张季鸾形象在塑造、共享、传承及重塑过程中各种因素复杂的博弈与协商,探讨了中国现当代集体记忆的形成机制。新闻界不仅建构家国记忆,也讲述自己的故事,籍此增强自身的文化权威和共同体意识。本专题另外三篇文章虽然研究对象各异,却不约而同地采纳了“阐释共同体”概念。陈楚洁和白红义分别以杨伟光逝世时的纪念话语和南方都市报十八周年的“口述史”作为研究对象,它们各代表了一种重要而有趣的“纪念契机”。而李红涛和黄顺铭则跳出个体或组织层面的个案,聚焦“记者节”这一常规性和仪式性的“热点时刻”,考察新闻界如何通过书写“新闻史”来再造传统与重塑模范。新闻媒体的“当代性”和记忆的“历史性”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张力,也带出了媒体记忆研究的理论意义。本专题除了郭恩强的论文结合各种史料勾勒“记忆社会史”的线索之外,其他文章多半以“记忆文本”为中心。我们希望,未来的媒体记忆研究在继续开掘记忆文本的同时,更多将分析触角向“记忆社群”的“记忆实践”延伸。

DOI:10.13495/j.cnki.cjic.2015.12.001

传统再造与模范重塑 ——记者节话语中的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

李红涛 黄顺铭

摘要

记者节对于新闻社群是一个仪式性和周期性的“热点时刻”。本文以不同类型的十二份报纸在2000-2014年间的记者节话语作为研究对象,探究新闻界如何将“历史”整合到关乎“当下”的专业话语之中。与“关键事件”或纪念场景不同,记者节的“记忆工作”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折射出新闻界深层的历史意识与集体记忆。我们发现,新闻界借助“常识知识”将自身的处境“历史化”,它们建构出记者节的“开端”神话,从“断裂”的历史中清理出“延续的”传统,并重塑“角色模范”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

记者节、历史书写、集体记忆、传统、角色模范

作者简介

李红涛,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黄顺铭,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本文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新闻从业者的‘阐释共同体’”(项目批准号: 13YJA860011)的资助。电邮: lihongtao@zju.edu.cn, smhuang2006@gmail.com。

Rebuilding Traditions and Reshaping Role Models: Historical Writing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Journalists' Day Discourse

LI Hongtao, HUANG Shunming

Abstract

The Journalists' Day is a ritualized and routine “hot moment” for journalistic community. Using the Journalists' Day discourse in twelve newspapers of different types during 2000 and 2014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Chinese journalists incorporate “the past” into their discourse about “the present.” Comparing with those “critical incidents” or commemorative occasions, the “memory work” on the Journalists' Day projects the profession's deep-seate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a more general sense. We contend that journalists rely on common knowledge to situate themselves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In this process, they create a “beginning” myth for the holiday, build a “continuous” tradition from the historical “ruptures,” and rearticulate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and implications of “role models.”

Keywords

Journalists' Day, historical writing, collective memory, tradition, role model

Author

Li Hongtao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at Zhejiang University and Huang Shunming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t Sichua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entitled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of Chinese Journalists” fund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 13YJA860011).

一、引言

从2000年11月8日以来,中国记者节已经走过了十五年的历史。对于新闻界的观察者而言,记者节是一个仪式性和周期性的“热点时刻”(陆晔,潘忠党,2002)。每年节日之际,新闻从业者、新闻机构、专业协会,以及新闻宣传主管部门都会有意识地开展某些仪式性活动(如新闻奖的颁奖),或是就新闻传播实践的某种议题表达立场。

在每年记者节话语的“众声喧哗”之中,经常闪现出新闻史的“零光片羽”。一方面,新闻从业者会不时在记者节报道、个人陈述或新闻评论中援引新闻前辈的言论,或者回顾新闻史上的经典片段。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将当下的新闻实践加以历史化。在记者节期间,媒体刊登的“年度回顾”或“纪念特刊”,将个体记者的讲述与对组织和新闻界成就的回顾结合起来,将刚刚过去的“历史片段”与悠久的新闻史对接起来。此外,我们也会看到,记者们带着“历史”意识来审视当下的焦点议题。例如,2008年记者节时,《中国青年报》就针对“山西封口费事件”发表了评论《封口费缠身的记者节没有荣耀只有雪耻》,其中写道,“临近这个记者的节日时爆出了近年来有关记者的最大丑闻,相信很多年以后记者同行仍会为这一幕感到耻辱,这一幕将会永远钉在中国新闻业的耻辱柱上”,展示出了某种“未来取向”的记忆建构。

新闻从业者自己在记者节写下的新闻史叙事不同于学者的新闻史研究和教科书上的新闻史,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这些或系统或散碎的历史书写构成了新闻社群“记忆工作”的一部分,其用意或为建构新闻业的某些传统,或为社群成员树立“角色模范”,或为透过历史来镜鉴现实。

本文以十二份不同类型的报纸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记者节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力图揭示当代中国新闻界怎样将自身的历史和集体记忆整合到他们的专业话语——特别是对于当下的理解——之中。

二、历史叙事与新闻界记忆

一年一度的记者节是新闻界反观自身的“热点时刻”(陆晔,潘忠党,2002; Zelizer,1993)。与那些围绕重大事件、典型现象或者焦点议题而展开的“热点时刻”不同,记者节带有更为常规的性质,也更多地折射出新闻界日常的话语实践。陆晔和潘忠党(2002)曾分析过新闻界如何利用第一个记者节来凝聚专业范例,阐发专业理念,建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有关记者节话语的研究基本上沿袭陆、

潘的思路,考察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例如,丁方舟等人(丁方舟,韦路,2014;丁方舟,2015)分析了新浪微博上新闻从业者所建构的记者节话语,发现“理想/现实”和“新媒体/传统媒体”构成新闻人最常使用的二元对立话语。

本文并不打算对记者节话语中的专业内涵进行全面的挖掘,而是要聚焦其中的历史叙事。由于记者节的常规性,新闻界在记者节话语中建构历史叙事成为其日常“记忆工作”的一部分。在阐述“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概念时,泽利泽(Zelizer,1993)就提到了“记者的新闻史”。她指出,新闻人会围绕新闻史上的某些关键事件来展开阐释活动,生产出大量反思性的话语。这些话语令新闻界对共享的过去形成特定的理解,为专业实践赋予意义,从而让新闻人彼此团结起来。泽利泽强调,新闻人将这些关键事件与更大的新闻困境和其他重大事件关联起来,由此创造出自己的新闻史。根据我们的观察,跟关键事件一样,包括职业节日在内的仪式时刻也会涌现出大量攸关历史书写和集体记忆的自反性话语。

舒德森(Schudson,1992)对“水门事件”的集体记忆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发现,新闻界将其建构为一系列彼此相连的神话,这些神话不仅揭示了新闻界在“水门事件”中的核心作用,而且更是将它建构成了当代美国新闻业的一个分水岭。问题是,新闻界关于该事件的神话化叙事未必与历史事实相吻合。最近,舒德森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指出,新闻从业者一方面对行业历史知之甚少,且多有错讹,另一方面则倾向于对过去进行自我美化。他们总是在怀念历史上的“美好时光”,以此作为批评当下的依据(邓建国,迈克尔·舒德森,2015)。

类似地,2003年的“孙志刚案”构成了当代中国新闻业的一个关键事件。作为推动制度变革的标志性事件,它在过去十年间不断引发新闻媒体的“重述”或“纪念”。张志安和甘晨(2014)发现,在对该案进行记忆建构时,中国新闻界并非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在新闻史层面,率先刊发“孙志刚案”报道的《南方都市报》将相关报道视为自身“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及辉煌篇章,而其他市场化都市报则将该案叙事为整个中国新闻界尤其是都市报行业的‘光荣与梦想’”。这种记忆建构的差异表明,中国新闻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共同体”,同时中国新闻人所追求的文化权威(推动社会和历史进步)也与西方同行有所不同。

不论是对于“水门事件”还是“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的研究都是聚焦于新闻史的某一个“断面”或“片段”。而与此不同,本文将以记者节话语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对新闻工作者的历史书写和集体记忆进行系统的考察,希望揭示出在“记者节”这一常规性的热点时刻,中国新闻从业者会在何种情境下、以何种方式去

“重访”新闻业的历史。具体而言,在这些历史书写中,哪些新闻传统和专业范例得到了强调或者弱化?历史和当下如何相互呼应,或者进行“对话”?新闻界如何通过新闻史的系统书写或者对于历史元素的策略性运用,来强化自身的专业权威和正当性?

三、研究材料与方法

由于各种类型、各个层次的新闻媒体都会在记者节前后刊载某些与节日有关的内容,企图对记者节话语进行“普查”显然是不现实的。一个可行的方案是,以“样本”来做考察。基于材料可得性的考虑,本研究将只考察报纸上的记者节话语。我们选择了十二份报纸作为研究对象,力求涵盖不同的类型和层次。具体包括:(1)五份党报或机关报,即《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和《南方日报》,其中,前三份是中央级报纸,后两份为省级报纸;(2)五份市场化的都市报或精英报,即《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南方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和《南方周末》,均为省级报纸;(3)两份行业报,即《中国新闻出版报》和《中华新闻报》,都是以新闻出版从业者为目标读者群的全国性报纸。

原则上,样本报纸的研究时段锁定为2000到2014年的全部十五届记者节。其中,《中华新闻报》是唯一的例外。由于该报已于2009年8月27日停刊,故只牵涉到九届(2000-2008)记者节。虽然国家法定的记者节是每年的11月8日,但事实上记者节话语在此之前和之后都有可能出现。因此,我们将材料搜索时段限定在记者节前后各一周,即11月1日至11月15日。在此期间,凡是文章中出现“记者节”这一表述,或者报纸版面上以某种可以辨识的方式(如标明“记者节特刊”)来建立文章与记者节之间的关联性,就是符合条件的研究材料,它们在体裁上可能是新闻、评论、通讯、背景资料,等等。

为了尽量不遗漏符合条件的材料,我们综合运用了纸版报纸、报纸电子版、慧科新闻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甚至部分报纸的内部数据库。最终,十二家报纸的记者节话语样本由近500篇文章构成,其中,《中国新闻出版报》的数量最大,达150余篇,其余各报文章篇数则在三、五十篇之间。

由于并非每一篇材料都牵涉到“记者节话语中的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这一主题,我们需要对样本作进一步的筛选。筛选原则是,凡是牵涉到新闻史上的人物、事件、作品和言论的材料都被纳入分析。受论文篇幅的限制,本文将只聚焦新闻史

上的“经典时期”——这里定义为“1978年新闻改革之前的时期”。至于记者节话语中的“当代史”，我们将另撰文来处理。最终，本文的分析基于含有经典时期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的128篇文章，由多到少依次是：《中国新闻出版报》41篇，《南方日报》16篇，《华西都市报》15篇，《人民日报》12篇，《中国青年报》11篇，《新民晚报》10篇，《新华每日电讯》9篇，《南方都市报》8篇，《解放日报》6篇，《北京青年报》5篇，《中华新闻报》2篇，以及《南方周末》1篇。这些材料篇幅不一，有些仅仅是以仪式化的方式提及角色模范（例如，通篇可能只有“长江韬奋奖”这一表述提及了两位历史偶像），或者顺带提及新闻史断片，而有些则包含了全面而系统的历史书写和集体记忆。

本文属于质性分析，主要依靠对历史叙事材料的反复阅读和文本分析。下文的分析将从“开端记忆”、“传统”和“角色模范”三个方面具体展开。其中，质性分析软件Nvivo 10.0被用来协助我们分析角色模范及其话语。

四、记者节与“开端”记忆

选择一个什么日子来作为节日是一件关乎记忆的事情。在论及“社会记忆”时，康纳顿(Connerton,1989)开宗明义地指出：“所有的开端(beginnings)都包含着一个回忆的元素。当一个社会群体齐心协力地寻求一个崭新的开端时，尤其如此。在性质上，任何这种刻意为之的开端(attempted beginning)都带有某种彻底的任意性。”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下的两个记者节，即民国时期的“九一”记者节和新中国的“一一·八”记者节。这两个精心选择的日期所唤起的，是两种不同的关于节日的“开端”记忆。

虽然我们所抽取的是一个关于一一·八记者节的样本，但九一记者节也不时被提及，具体表现为“模糊提及”和“明确提及”这两种方式。从模糊提及中，读者无法从字面上获得节日日期等最基本的信息，例如，“当时的记者节”，“中国虽曾经有过记者节”，以及“其实新中国成立前，也曾有过记者节”。相对而言，模糊提及不如明确提及常见。在所有明确提及的文章中，以2005年记者节时《中国新闻出版报》的《中国“记者节”的变迁》(2005.11.8)一文最为详尽。该文将九一记者节框架为一个“争取新闻自由”的抗争叙事，新闻界和国民党当局分为正义和邪恶的一方。

1933年1月，江苏《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焜生因揭露国民党官员公开卖鸦片黑幕及吸毒丑闻，被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下令以“宣传共产”的罪名

杀害，当时的新闻界强烈抗议此暴行，并要求国民党当局“开放舆论，保障人权”。强大声势之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9月1日被迫颁布《保护新闻从业人员及保护舆论机关的通令》。

1934年8月，杭州记者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发出通电，倡议定9月1日为记者节。

1935年开始，“9 1记者节”得到全国新闻界的承认，每逢此日，各地都集会庆祝，出版特刊。

这些文章为何会提及九一记者节呢？大多数时候，它只是被当作与新记者节相关联的一个“历史背景”，或者说，作为“热点时刻”的新记者节为旧记者节这一新闻史断片提供了被讲述的契机。然而，有时候，新旧并置却是为了刻意实现“今夕对比”的叙事意图。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首个记者节到来之际，新华社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牢记神圣的历史使命》，其中写道：“在旧中国，渴望民主的新闻工作者对当局政治迫害的反抗为他们赢得了9月1日记者节，那是凄风苦雨的日子。他们时刻面临屠戮、监禁、停刊和失业。而在新中国的11月8日，党、政府和人民给予全体新闻工作者的是关怀、重视、奖赏和激励。”文章将“旧中国”的九一记者节与“新中国”的一一·八记者节相对照，努力建构出一个进步主义的历史叙事。在此，我们不仅看到了泛化的“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对照，而且还看到由此而引申出的“新旧”新闻界的对照。虽然对于九一记者节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事实，但用“凄风苦雨”和“时刻面临屠戮、监禁、停刊和失业”来形容整个民国时期的新闻环境，则无疑是片面甚至极端的，也与其他话语场景下所构造出的民国新闻业图景相去甚远。显然，记者节只不过是一个引子，新旧对照旨在彰显新中国新闻体制的优越性，换言之，旧的新闻建制成为衬托当下的一个“反面教材”。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九一记者节也被废除。直到2000年1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才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确定“记者节”具体日期的请示》，后者于同年8月初批准每年11月8日为记者节。在首个记者节时，样本中的十二家报纸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或详或略地叙述了新记者节的历史由来。后来的每一届记者节，都会有文章对此进行重温。在这些关于节日的“开端”叙事中，最核心的记忆是一个“历史性开端的神话”（myth of a historic beginning）（Connerton, 1989）——1937年11月8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简称“青记”）的成立。例如：

12 63年前的11月8日，范长江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旨在团

结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新中国建立以后，这个协会历经周折，发展成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成为团结全国新闻工作者的纽带；今天这个“记者之家”诞辰的日子被定为中国记者的节日。回首世纪沧桑，这是中国记者几代人的光荣与骄傲！（《今天是我们的节日》，新华每日电讯，2000-11-08）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新闻界同仁为推进新闻战线的抗敌斗争，深感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1937年11月4日下午，《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和新闻界同仁胡愈之、夏衍、碧泉、恽逸群、章汉夫等在一起商量，决定组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称“青记”）。11月8日晚7时，该协会在上海山西路南京饭店举行了成立大会，推举范长江、恽逸群、羊枣、碧泉等5人为总干事，夏衍、邵宗汉等10余人作为候补干事。会议认真讨论了战事的发展趋势，并授权范长江筹备协会的武汉分会。（《范长江促成记者节》，北京青年报，2006-11-06）

尽管这两个语段详略程度有别，它们都明确地建构出一个“团结抗战”的抗争叙事，包括新闻从业者在内的中国人民和日本侵略者分为正义和邪恶的一方。总之，新、旧记者节虽然同为抗争叙事，但一为国内抗争，一为民族-国家层次的抗争。

尽管康纳顿说得没错，任何刻意为之的开端都具有某种任意性，然而我们仍有必要追问，为何选择的却是“这一个”开端呢？具体到这里，两个记者节为何会选择9月1日和11月8日呢？最基本的原因恐怕在于，一个社会、群体或职业需要为节日建构出某种有望获得广泛认同的“神圣性”，否则节日的合法性容易受人质疑。杭州记者公会把1933年9月1日国民党政府颁布通令视为争取新闻自由取得胜利的一个象征性事件，通电全国，倡议九一记者节，最终得到了职业共同体的广泛认同。而就一一·八记者节而言，中国记协将自身历史的“开端”神话——“青记”的成立——作为职业节日的开端。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青记”的成立被纳入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叙事框架之中；若再往前推衍一步，它自然也被纳入到了新中国的建国神话的叙事框架之中。因此，这个日子能赋予记者节一种政治性的资本与荣光。另一方面，中国记协显然有意让记者节的神圣性“溢出”到它所主持的最高新闻人物奖——长江韬奋奖，进而唤询当今的新闻从业者追随新闻史上的著名角色模范来增强自身的职业认同和荣誉认同。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历史前提，即范长江是“青记”成立过程中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在前引的两个语段中，第一段将青记发起人略称为“范长江等人”，第二段尽管在正文中列举了总干事名单，标题却是《范长江促成记者节》。在样本中，我们经常见到“以范长江

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的类似表述，通过遮蔽其他发起人和领导者来达到突出范长江在“开端”神话/记忆中的地位。个别文章甚至不惜扭曲历史事实。2009年，适逢范长江百年诞辰，不止一家报纸载文称是范长江创建了“青记”，并称记者节正是为了纪念他。例如，《新华每日电讯》在《做百姓记者用脚板跑新闻》中这样写道：“为纪念范长江同志，每年的11月8日，即他创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日子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以他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成为我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尽管这一叙述有违历史事实，然而却并不太会让新闻从业者感到格格不入。原因很简单：中国记协多年来一直将长江韬奋奖的颁奖典礼作为记者节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因此这一仪式实践有助于该语段中的逻辑得以“自然化”（naturalized）。

五、经典的、另类的与发明的传统

（一）新闻业的经典传统

中国新闻业渊源庞杂，从民国到新中国，新闻体制与意识形态更是几经更易与转折。李金铨(2004)指出，中国新闻业的原始基调是儒家自由主义，从梁启超到胡适再到储安平，都通过创办杂志开启民智，打造出“文人论政”的传统。而近现代中国的主流报纸则大致存在三种范式，分别是民营商业报纸（如《申报》、《新闻报》）、专业报纸（如《大公报》），以及党报系统（如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和《中央日报》，共产党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李金铨,2008)。

如何在“断裂”之中努力寻求“延续”的新闻传统，如何将当代新闻业与经典传统“接续”起来？这是记者节话语“再造”新闻传统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叙事挑战。我们发现，记者节话语对于经典传统的勾勒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所谓经典传统或者新闻业的“正统”，其内核是红色新闻业，外延是“进步”新闻人，文人论政传统、商业报刊传统和国民党报人处在边缘地位甚至彻底缺席。以梁启超为例，他在样本中仅被提及一次，文章称其“最早提出了新闻舆论监督思想”。第二，与新中国成立后单一的党的新闻事业相比，民国时期新闻业的状况要远为驳杂，这就带来了更多叙事上的困难。因此，建国后的新闻史叙事多强调经典的新闻作品，而民国时期则以著名新闻人物和红色革命家史为基本的叙事模式。这些经常被提及的新闻人物包括范长江、黄远生、邵飘萍、邹韬奋等，他们多从属于“进步”传统。第三，与上文引述的范长江和“青记”的例子相类似，经典传统叙事常常凸显核心人物，弱化其他人物，致使历史建构流于简单化。

当首个记者节到来之际，新华社电文《今天我们的节日》用很大的篇幅来梳理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提供了最为系统的经典叙事。文章将现代中国新闻业的开端追溯到申报于1870年代对“杨乃武案”的报道，而整个历史叙事的重心则放在党的新闻事业。文章先以“我们不能忘记”的三组排比句，列举新华社历史上因公殉职的记者，分别是1947年在敌占区采访被捕而牺牲的钱毅，1955年奔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途中遇难的沈建图，以及1999年在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中牺牲的邵云环。三个历史时间点串联在一起，也是为了建立一以贯之的光辉传统。文章随后列举一系列党的新闻事业的优秀作品和践行者，包括50年代《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抗美援朝报道、郭超人的攀登珠峰报道、罗开富80年代重走长征路、穆青采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60年代的《“一厘钱”精神》、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范敬宜的《莫把开头当过头》、深圳特区报1992年3月26日发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以及中央电视台1994年4月1日开播的《焦点访谈》栏目。显然，这里强调的并不是这些作品在新闻专业上的成就，而是它们与“重要历史节点”的呼应，比如“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等等。这一点在下面这段表述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年轻的范长江历时10个月，万里走单骑，发表了轰动全国的《中国的西北角》；著名摄影家沙飞，用相机镜头记录下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悲壮瞬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穆青奔波在兰考大地，兰考人民称赞他长着“八路军的腿，老百姓的嘴”，誉他为“活着的焦裕禄”；1992年，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一篇《东方风来满眼春》，生动反映了时代巨人视察南方的身影，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浪潮。（《肩负起时代的使命》，人民日报，2006-11-08）

从范长江到陈锦添，历史时空几经变幻，不变的是“人民的记者”“和人民同呼吸、和祖国共命运”的传统。这再一次表明，经典传统所强调的乃是新闻事业融入革命和建设的“时代大潮”，推动历史进步。

同样地，秉持专业主义准则的市场化媒体也参与了构建经典新闻传统的叙事。例如，2006年记者节当天，《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记者的权力》，其中写道：

今天是中国记者节。在这样的时刻，总令人遥想当年叱咤风云的前辈们，远的如民国时期不畏强权被张作霖杀害的一代报人邵飘萍，近的如在1978年掀起真理标准讨论的光明日报，正是他们对新闻的执着追求，就像灯塔照亮我们前赴后继，走上这条极富理想色彩的星光大道。（《记者的权力》，南方都市

报, 2006-11-08)

这里提及的两个经典的新闻史节点相隔半个多世纪, 跨越了民国和共和国的制度更迭。作者的用意既不在于强调新闻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 也不在于强调新闻人的“道德”标杆, 而是试图回到“新闻”本身, 将这个传统的精髓提炼为“对新闻的执着追求”, 并以“灯塔”和“极富理想色彩的星光大道”来进行隐喻化。

(二) 另类传统的建构

可以说, 正是上述这些名字、作品与历史断片联缀成了记者节话语中最具有支配性的经典传统。不过, 在经典传统之外, 某些媒体也力图拓展出一个另类的叙事传统。上文所引的《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即带有一定的另类色彩。另类叙事的建构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方式之一: 选择被正统叙事边缘化的人物, 纳入“典范”的行列。例如, 《南方周末》2000年11月9日记者节特刊“光荣”版面列举了六位新闻史上的著名人物: 前四位(黄远生、邵飘萍、范长江和邹韬奋)是前述经典传统中的典范人物; 第五位是《文汇报》创始人、“能够坚持做记者的总编辑”徐铸成; 最后一位则是最具独立色彩的储安平, 其个人小传这样写道:

对国家民族有强烈责任感, 又据理性加以公开的建言, 这是储安平所看重的那一批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色, 也是中国传统的书生议政的薪传。到主编《观察》周刊时, 储使之达到了极致……在当年国民党与共产党争夺对中国的主导权的动乱年代, 储和《观察》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 历史证明了此路不通, 但储和《观察》也在历史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

《南方周末》对于储安平给予了两个定位, 即自由知识分子和“书生议政”(或文人论政), 而这两点都是正统叙事所忽视的。至于对“第三条道路”的强调, 则旨在强调报业独立性的价值。“此路不通”和“打下……烙印”之间的转折逻辑隐然透露出不以成败(或立场)论英雄的新闻历史观。《南方周末》所建构的荣耀殿堂在承认新闻正统的前提下, 也引入了边缘性的职业典范, 并在“记者节”这一仪式时刻推出, 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象征意味: 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秉持专业主义理念的市场化媒体对于“新闻正统”和“范例”的补充乃至挑战, 以及对于新闻业可能性的另类想象。

不过, 绝大多数时候, 市场化媒体对替代性传统的建构并没有走这么远, 它们更多地采用第二种方式, 即对已经被纳入经典传统的新闻人物或事件加以另类解释。例如, 《南方周末》同一版在介绍邹韬奋时, 强调他“一生坚守独立精神的报

格、人格，绝不肯将社会给予的‘信用’转送、附会”。再举邵飘萍为例，正统的新闻史叙事强调他死于军阀之手，是为新闻而牺牲，如《南方日报》给他贴的标签是“在80年前的血雨腥风中以身殉报的《京报》创始人邵飘萍”。然而，另类叙事则强调其他品质。2006年11月6日，《南方都市报》刊载的《邵飘萍：幸还是不幸》一文强调，黄远生和邵飘萍代表了本国新闻史中的“独立性”传统，之所以“他们留下的文字几乎可以当作信史来看”，“就在于他们坚持了新闻的独立性，而没有依附于当时的不同势力和利益”。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建构另类传统的过程中，市场化媒体并没有将民国时期的商业化媒体引为典范。这大概缘于市场化媒体内部的分化，其中的商业性媒体（如《华西都市报》）大致依循党报所建构的正统，而精英媒体则更强调“独立性”等专业价值，由此而反向地溯源或者投射到了新闻史的某些人物和组织。

（三）“被发明的传统”

从当下的新闻业情境或“现实需要”出发，记者节话语致力于寻求历史脉络中的“传统”，或者对新闻传统进行重新阐释，以此改造历史叙事“古为今用”。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有“三贴近”和“走转改”，它们都是近年宣传主管部门所提出的新闻改革话语和实践。在记者节话语中，它们都被与“群众路线”接续起来，建构为对它的一种“继承”和“延伸”。在此过程中，在经典新闻传统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著名新闻人也会因为当下的需要被“挪用”或“重释”。2013年记者节当天，《人民日报》的评论《记者的荣光永在前方》就生动展示了这一过程：

正如马克思所说，记者应当生活在人民当中，“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从范长江提出“一张报纸，一个记者，其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到穆青以“勿忘人民”激励青年，再到“走转改”活动提倡“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激荡不变的是赤子情怀。

不论是范长江，还是曾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他们都是经典传统的代表人物。将穆青与范长江相并置，要强调的并不是范长江的典范地位，而是他在1960年代关于“群众路线”的言论。这段话从马克思开始，贯穿了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以“赤子情怀”作为核心，建构出一个悠久的人民报刊的传统。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接合，“走转改”不仅被赋予正当性，而且肩负起重振（失落的）“传统”的使命。

就穆青而言，除了“勿忘人民”的格言之外，最经常被提起并当作走转改活动之“范例”的便是他参与的对焦裕禄的报道。2011年记者节期间，中宣部、中国记

协组织部分中央和地方媒体的记者编辑奔赴河南兰考，“以深入基层实地调研采访、征求基层干部群众对新闻宣传工作意见的特殊方式迎接自己的节日，表达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坚定决心”（《拜人民为师向实践学习》，《新华每日电讯》，2011-11-09）。诞生过焦裕禄报道的兰考被树立为一个与“走转改”相关联的饱含象征意义的“记忆之场”。这次重返历史现场显然属于节日仪式操演的一部分，它不仅再次确认了焦裕禄报道的范例意义，而且更是一个针对当下新闻改革话语和实践的集体性地“表决心”姿态。

在当代新闻史上，穆青一直被看作新闻宣传战线的典型。不过，在以“走转改”为主题的记者节话语中，新闻界所强调的并不是穆青的“道德品质”，也不是焦裕禄报道作为文本的经典意义，而是该报道体现出的“扎根群众”的采访方式，由此就与“走转改”活动建立起了直接的传承关系。一些文章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唤询”。例如，《人民日报》的评论《做人民的记者》（2011-11-09）就号召新闻工作者，“要像穆青同志那样以‘勿忘人民’为座右铭，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实践当成最好的课堂，把人民当成最好的老师，在向实践、向人民学习中不断提高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能力，真正做‘人民的记者’”。

更值得关注的是记者节话语对这则范例的表述方式。上引新华社的电文称，“1966年，穆青等3位新华社记者深入兰考蹲点调研，写出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新闻史名作由穆青、冯健和周原三人合作合署，但记者节的历史叙事绝大多数强调穆青，另两人被一笔带过，比如“新闻界老前辈、当代著名记者穆青同志等人深入兰考采访”。不少时候，另两人甚至完全被略而不提，例如，“穆青奔波在兰考大地”，“一提到焦裕禄，人们就想到新闻记者的榜样穆青”，“无论是巍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还是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我们来到兰考，就是要继承和发扬穆青同志‘勿忘人民’的精神”。总之，记者节话语中的穆青被重塑为“群众路线”的代表人物或“符号”，当代“走转改”活动的“精神起点”，然而却也有意无意地简化甚至歪曲了历史。顺便指出，“开端记忆”一节提到的片面强调范长江而弱化其他“青记”同人的做法和这里片面强调穆青而弱化其他合作者的做法如出一辙，都是“个人化的”历史书写思维，也印证了新闻声誉累积过程中的“马太效应”。

六、角色模范及其话语

（一）谁是角色模范？

任何节日几乎总是会努力发掘并建构出某些历史的或当代的典型人物，以便人格化其尊奉的理想的价值体系与行为方式。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讲，这些人就是“角色模范”（role model）。具体到记者节这里，角色模范同样是一个基本问题。在本文中，我们的分析将聚焦于历史角色模范，尤其是“经典时期”的角色模范。

样本中提及了数十位角色模范，大多数是中国新闻人。不过，被三篇及以上的文章提及者却屈指可数，仅有范长江、邹韬奋、邵飘萍、张季鸾、黄远生、林白水、李大钊、瞿秋白和史量才。在少数外国角色模范中，被三篇及以上的文章提及者仅有两人——马克思和普利策。在性别上，记者节话语里的角色模范高度失衡，男性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经典时期的性别失衡尤为严重，女性只有秋瑾和陈香梅，各被提及一次。由此，可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记者节话语里的职业角色模范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民族-国家的象征秩序，同时也构成了一种典型的父权制的象征秩序。

记者节话语里的角色模范在政治光谱上颇为复杂。以左中右而论，在被三篇及以上文章所提及的角色模范中，李大钊、瞿秋白和范长江（中共党员）、邹韬奋（死后被中共追认为党员）和邵飘萍（中共秘密党员）属于“左派”，林白水、张季鸾和史量才属于“中间派”，而黄远生早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成立以前就死了，故不纳入“左-中-右”的架构中来定位。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南方周末》在第一个记者节时推出了“记者节特别报道”，其中“光荣版”上筛选出六位角色模范——黄远生、邵飘萍、范长江、邹韬奋、徐铸成、储安平，也同时对“左派”和“中间派”（徐和储）新闻人赋予了显要的社会承认。我们可以由此得出另一个结论：记者节话语往往借助“左派”和“中间派”的历史角色模范来定位、反思和想象当下的新闻业。

在角色模范的选择上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加冕“创伤”（trauma）的文化心理，尤其是对于“死亡”的意识形态化，即把为新闻殉职、为国殉难的新闻人，抬升到极高的地位。这固然与二十世纪中国动荡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关，但或许也可以说，这种文化心理构成了近现代以来新闻史上一个恒久的价值观（enduring value）。在记者节的庆祝话语里，秋瑾、黄远生、邵飘萍、刘煜生、何云、钱毅、“亚非会议七烈士”、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以及甘远志都是以死亡的方式而完成了自身的职业-政治意义。例如，《海南日报》的甘远志因公殉职后，事迹很快被拍成电影，中宣部和记协要求全国新闻界开展向他学习的活动。

至于角色模范的提及方式，则可分为“单一提及”和“复合提及”。单一提及

是指整篇文章只提及某一位角色模范。当遇到某位历史角色模范的重要纪念年份时,采用该方式就拥有足够的正当性。例如,2005年,适逢抗战时期为筹办《新华日报》汉口版和华北版做出重要贡献的何云的百年诞辰,《解放日报》在记者节当天发表《永远的丰碑:太行深处编报人何云》,就采用了这种提及方式。复合提及意味着一篇文章中出现了不止一位角色模范,存在几种不同的具体做法。最常见的是,在一篇文章的不同位置分散地提及角色模范。另一种做法是,在一个句子中把多个人物相并举而建构出一个角色模范群。例如,2007年11月6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就这样写道:“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这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风云人物的革命生涯,几乎都是从办报、办刊开始的。”还有一种建构角色模范群的做法就是,通过拟定一个富有涵盖力的标题,并辅之以版面编辑的手段。在第一个记者节时,《华西都市报》运用这种此方式,将毛泽东、周恩来、李大钊、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高尔基等人归为一组,而将秋瑾、恽代英、钱毅、伏契克以及汉斯-希伯等人归为另一组。

这两种角色模范的提及方式各有其社会控制功能。单一提及令新闻媒体及其主管部门得以策略性地对中国近现代新闻史进行“重写”,发掘那些已经或几近被遗忘的角色模范,赋予他们新闻史上的某种地位。而复合提及的社会控制功能则源于它可以灵活而策略性地选择出某些角色模范来加以并置。将几个彼此在生命或职业上存在或不存在交集的人相并置,既可以让记者节实现面向现在和/或面向未来的某种“载道”目标(如“走转改”),也能引申出某种职业“传统”(如“群众路线”),从而完成对节日意义体系的塑造。

(二)“格言”的话语实践

在记者节这一仪式化的“热点时刻”,历史角色模范的某些被认为精辟或隽永的话语经常被援引来作为一种符号资源。我们把这一做法称为“格言”的话语实践,它是指记者节文章中以某种方式援引历史角色模范的话语,以便实现当下的某种传播意图。格言的话语实践诉诸于“集体记忆”的文化逻辑:角色模范在过去所说的话成为了后辈们文化记忆库的一部分,并在记者节时被激活,用于建构当下节日的某种话语主题。可见,这种话语实践提供了一个审视“历史”与“现实”之间对话的独特机会。

粗略的统计显示,在经典时期的角色模范中,被援引了格言者不下二十人。不过,被援引了两则及以上不同格言的人却屈指可数,仅有范长江、邹韬奋、邵飘萍、穆青、储安平、普利策,以及马克思。其中,以范长江的格言被引用得最为多

样化，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范长江在共产党新闻事业里所占据的中心位置。

我们可以按两种不同的标准来对格言话语实践加以分类。一是，根据格言援引的“真值”程度而分为“正常引用”和“套用”。前者是指以直接或间接引语的方式据实援引。而“套用”，则意味着作者通过故意改变原话而试图表达某些新意义。例如，“套用美国报业大亨普利策的说法就是‘倘若灾难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我们，行走在记录的路上》，华西都市报，2008-11-07）。作者用“灾难”替换了原格言中的“国家”一词。当然，此处的套用显得非常机械。

二是，按照是否明确交代被引格言的话语主体而分为“明确引用”和“模糊引用”。样本中大多数时候采用的是明确引用。在这种情况下，角色模范（如范长江和穆青）自身的地位会强化格言的“力量”。而模糊运用最频繁的一句格言应该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几乎没有引用者标出格言语出李大钊，或许这句格言已经变成了新闻界常规语汇的一部分。有时候，模糊引用对于读者的知识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例如，当一名普通读者面对下面这句话，新闻界对自己的角色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把国家比作一艘航船，新闻工作者就是船头的哨兵，他监视着水下的暗礁和复杂的气候情况”（《面对无聊新闻，是漠视还是在谴责中传播》，中国青年报，2006-11-10），未必清楚格言出自普利策之口。而如果模糊引用不能让读者“认出”或“想起”特定的角色模范，那么诉诸于“集体记忆”逻辑的格言话语实践在传播效果方面便会大打折扣。

模糊引用也有一种微妙的情形，即作者故意不明确交代角色模范。例如，“曾有位新闻前辈这样解释记者节的含义：‘我以为应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记者的节日……再一解释就是记者节操’”（《记者节感想》，中华新闻报，2004-11-08）。模糊引用成为“弱化”格言作者的方式，也许是因为作者在政治上属于“中间派”，所在的《大公报》代表的并非共产党的党报新闻范式，而是以“四不主义”立报的专业报范式。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明确引用也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形。“节日节操论”便是最典型的例子。1940年9月2日，王芸生在重庆版《大公报》发表社评《“记者节”》，为记者节的“节”字赋予了“节日”和“节操”的双重内涵（曹立新，2012）。这一格言在我们的样本中屡次被明确援引，然而却没有一篇文章正确地指出其归属（王芸生），均错误地认为语出张季鸾。根据我们的搜索，2003年记者节时，搜狐网发表了题为《记者的节日与记者的节操》的评论，率先将这则六十多

年前的格言从故纸堆中“打捞”出来，用于批评当年山西繁峙矿难中的记者受贿事件(束学山,2003)。十年后，新闻杂志《博客天下》(2013-11-15,第31期)在记者节之际也引述这一格言，并且还重刊了1944年9月1日《大公报》发表的社评《祝记者节》，署名为张季鸾。可事实上，张早在1941年即已辞世。长期的张冠李戴，既说明当今新闻从业者对于民国新闻史缺乏足够的了解，也说明张季鸾在他们心目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对“节日节操论”的调用还存在另外一重扭曲，即对“节操”意义的重新诠释。这说明，格言话语实践中“过去”向“现在”发话时表现出了一种“古为今用”的逻辑。

新闻界前辈张季鸾，上个世纪40年代曾对“记者节”作过两个解释：一是记者的节日，一是记者的节操。今天的记者，无疑面临更多考验。从“排队领封口费”到“陈永洲事件”，虽然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却仍足以让人警醒：金钱、权力，总有大于想象的诱惑力。(《记者的荣光永在前方》，《人民日报》，2013-11-08)

这段评论的核心指向是，在“节日”之际拷问“记者的节操”，是对封口费和陈永洲事件的批判。只不过，这里的“节操”含义已不同于王芸生的本意。在1940年的社评中，王芸生从《荀子》“君子”篇出发，强调“我们所守的节操，就是要为国家尽忠，为社会行义”。他把“节操”视为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更多地从“名节”或“气节”出发，铺陈出记者在战时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然而，在近年的记者节话语中，“节操”的意义几乎无一例外都被高度收窄到“私人道德或伦理”层面，指向新闻记者有悖职业伦理的行为，而“节日节操论”也变成了批评相关事件或人物(如“陈永洲事件”)以及新闻敲诈、新闻道德滑坡等一般性现象的话语资源。

大体上，记者节里的格言话语实践不外乎这样两种用途，即“范式重申”和“范式修补”。一方面，在记者节的仪式时刻，新闻界对照自身在过去一年来的良好表现，来重申在中国现行新闻体制之下新闻业的一些基本理念与准则，诸如新闻媒体的“记录者”和“守望者”的社会角色，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新闻的党性原则，以及新闻的职业操守。援引那些已用一生树立起了自身职业权威的角色模范们的格言能够为抽象的新闻理念和原则赋予一种“人格化”的说服力。此乃范式重申的社会功能。而另一方面，在仪式时刻，新闻界也会对过去一年中典型的越轨行为——新闻从业者可能是作恶者(如收受贿赂)，也可能是受害者(如记者被打)——进行检讨或发出呼吁，让某些受损的理念和准则(如媒介公信力)得以修

补，从而继续对新闻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历史角色模范的格言经常被拿来作为范式修补的符号资源。我们认为，这两种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七、结语

尽管记者节是新闻界常规的热点时刻，历史书写却并不是记者节话语的内核，与其他专门的“纪念”场景相比，记者节生产出的历史叙事缺乏特定的焦点和指向。如前所述，它们更多展示出“常识性的知识”（common knowledge），不仅失之于简单化，甚至不乏错讹之处。那么，对“记者的新闻史”进行研究又有何意义呢？新闻人不是历史学家，对其历史叙事的准确性和丰富性，似不必苛责。正是在这样一个非纪念性的话语场景之下，新闻记者者在有意或无意间所提及的新闻传统的断片或角色模范折射出了中国新闻界深层次的历史意识、新闻文化与集体记忆。

与围绕“关键事件”而展开的论述不同，记者节话语中的历史书写代表着更寻常的“记忆工作”，它所建构的也是更具一般意义的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我们对十二份主流报纸的分析发现，新闻界试图将自身的处境“历史化”，这不仅包括记者节“开端”神话的建构，也包括从头绪纷杂乃至“断裂”的历史中清理出某些“延续的”新闻传统，并重塑“角色模范”的当代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值得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同类型的媒体在“记忆工作”方面的异同。就新闻传统而言，尽管市场化媒体也跟党报媒体一样，参与了正统传统的建构，然而前者有时候也会挖掘一些另类传统，来标举自身的合法性与文化权威。不过，这种差别不应被过分夸大。毕竟，它们大体上共享着共同的历史资源和为数甚少的“范例”，而市场化媒体也是在接纳官方大叙事的前提下来适度地做了一些“另类”文章。此外，无论是党报媒体还是市场化媒体，都在历史叙事中自觉地凸显新闻人对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并以此作为新闻正当性的核心基础。

第二个富有理论意义的问题是“历史”与“当下”的关联方式，或者说，新闻记者如何将历史带入面向当下的话语实践之中。无论是对于新闻传统还是角色模范的分析都发现，在记者节的话语中，对新闻史的讨论不时地跟“当下”纠缠在一起。历史被“挖掘”出来，“挪用”到新的场景之下，要么被“重构”为当下议题的历史源头或正当性来源（“被发明的传统”），要么被“改造”为评判当下的标准（“今不如昔”）。在此过程中，历史叙事也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乃至“美化”），新闻史人物的模范意义也被重塑。

（责任编辑：方惠）

引用文献 [Reference]

- 曹立新(2012).《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L. Cao (2012). *Between regulation and freedom: A study in journalism history of Chongqing during wartime*.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邓建国,迈克尔·舒德森(2015).我对新闻业未来谨慎乐观——迈克尔·舒德森学术访谈.《新闻记者》,(2),4-12.
- [J. Deng & M. Schudson(2015).I a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A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Schudson. *Journalism Review*,(2),4-12.]
- 丁方舟(2015).“理想”与“新媒体”: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与权力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3),6-22.
- [F. Ding(2015).“Ideal” and “new media”: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and power relations in Chinese journalistic community.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3),6-22.]
- 丁方舟,韦路(2014).社会化媒体时代中国新闻人的职业困境——基于2010-2014年“记者节”新闻人微博职业话语变迁的考察.《新闻记者》,(12),3-9.
- [F. Ding & L. Wei(2014).Professional dilemma of Chinese journalists in the social-media era: Exploring the transition of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 discourse on the Sinamicroblog during 2010 and 2014. *Journalism Review*,(12),3-9.]
- 李金铨(2004).从儒家自由主义到共产资本主义:记者角色的冲突与汇流.载李金铨(编),《超越西方霸权》.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C. C. Lee(2004).From Confucian liberalism to communist capitalism: Contestation and convergence of journalists' role conception.InLee, C.-C.,*Beyond Western Hegemon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李金铨(2008).序言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载李金铨(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C. C. Lee(2008).The preface to the Criticizing the politics by the literati.InLee, C.-C.,*Criticizing the politics by the literati: 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press*.Guili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陆晔,潘忠党(2002).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71),17-59.
- [Y. Lu & Z. Pan(2002).Imagining professional fame: Constructing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n China' s social transform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71),17-59.]
- 束学山(2003).《记者的节日与记者的节操》.检索于<http://news.sohu.com/38/33/news215343338.shtml>.
- [Xueshan Shu (2003).from<http://news.sohu.com/38/33/news215343338.shtml>.]

张志安,甘晨(2014).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双重叙事者的阐释社群:中国新闻业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55-77.

[Zhian Zhang & Chen Gan(2014).A Case Study on Chinese Journalistic Collective Memory: History Told by the Journalism and on the Journalism.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1),55-77.]

Connerton, P. (1989).*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udson, M. (1992).*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Zelizer, B. (1993).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0 (3), 219-237.